

競選中央民意代表回憶

周雍能原著 · 王紹齋校訂

競選制憲國大代表

依據建國大綱之規定，建設程序分爲三期：

一軍政時期，二訓政時期，三憲政時期。民國十七年十月，國民政府既統一全國，乃制定訓政綱領，開始訓政。十八年六月，頒布訓政時期國民政府施政綱領，並明定訓政時期爲六年，至民國廿四年完成。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時，中國國民黨有結束訓政，召集國民大會，制定憲法之籌議。是年十二月，其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，遂有籌備國民大會之決定。二十四年十二月四日，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議，定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爲召開國民大會日期，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並應於十月十日前辦理完竣，於是國民大會由決定召開而進入籌備階段矣！民國廿五年，我正是第二次擔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長之職，因故鄉鄆陽地方士紳之推舉，遂決定請假返鄉參加國大代表之競選。那時江西全省共劃分爲八個行政區，贛北十二縣屬於第五行政區，分配有四個代表名額。經各方面協調結果，決定推出張雪中、洪軌（前裕臺公司董事長）、李中安（浮梁人）和我四人競選。姜伯彰亦爲鄆陽人，因我之出馬遂決定退讓。候選人須到南昌省黨部接受面談，面談通過即無異當選，一切尙稱順利。

中國實行民主憲政，此爲開端；學步之初，當然難免有不盡理想之處。除名單內定，可不必激烈競爭而當選外，只因地方黨部發展過快，負責黨務人員良莠不齊，每有藉此作威作福，欺壓善良之事發生。例如某區候選人王澤民同志（後爲立法委員）於登記時，因黨部某利用職權從中作梗，以致因逾越時限而被取消資格。王澤民同志本爲資深黨員，德望甚隆，又有士紳張某等多人之支持，到黨部理論，却遭黨工人員當面喝斥。

當時我也在場，親見承辦人對王等一行高聲斥責，混亂是非，氣餒之盛，令人不忍坐視。反觀王、張等人則忍氣吞聲，面帶激忿之情。我心中十分難過，欲呼不平又恐遭人藉機陷害，遂隱忍作罷。同時南昌市工會某職員出馬競選，因鑒於其嫡親舅舅之資歷與道德學問均遠勝於己，爲達目的，不惜以歡宴舅舅爲藉口，從而破壞其座車，使無法如期辦理登記。而事發後，此人並未受到應得之處分，使人聞之遺憾！

國大代表雖已選出，但因抗戰軍興，格於時勢，國民大會之召開遂一再延期。至三十四年十月，國民政府以勝利來臨，定期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，至三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，國民政府復邀集各黨派舉行政治協商會議，協議第一屆國民大會之主要職權爲制定憲法。按此以前，一般國代之議論約可分成兩派：一派主張制憲

而不選舉正副總統，此以黨方人士爲主；一派主張制憲並立即行憲，以自由派人士爲代表。

自由派首次發揮威力，是在國民大會召開之後。當時政治主流派的陳立夫、陳誠、朱家驊等負責人，爲期控制大會，擬定了幾條議事規則交由大會討論。自由派同仁首先發難，十八尊大砲從樓上樓下四面八方連珠攻擊，一時砲聲隆隆，震驚全場，連朱家驊也不得不刮目相看。某次，自由派同仁在中央飯店聚餐，某方面特派人來打聽虛實，回去報告說人數多達五百餘人，聲勢極爲浩大。其實當日參加聚餐者各方面人士均有，並不限於自由派。由此可見自由派在當時確有舉足輕重之地位。

國民大會歷經六次之延期，終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在南京開幕，合計先後報到代表總數爲一千七百零一名。大會的重頭戲之一是選舉主席團。主席團名額核定爲五十五名，除保留九名予當時尙未報到的共產黨及民主同盟代表外，大會先選出四十六名。但鑒於與會代表甚多，選舉技術有困難，遂決定由各選舉區代表自選十分之一爲候選人，再提交大會決選。江西省共有代表四十六人，按規定可以選出五名，結果由我、段錫朋（中央委員）、桂永清、甘家驊（朱派）、王又庸（政學系）五人當選。我伴獲最高票，受此鼓勵，爲不負江西人士之囑託，只有更進

一步出競主席團。由於事出臨時決定，在時間上已落後一步，不若別人胸有成竹，早有準備。爲了競選，我印就一封致全體國代的公開信，略謂：「鄙人才疏識淺，本無意競選主席團，但江西預選倖獲最高之票，如不繼續競選到底，顯係自暴自棄。而事出匆促，限於時間，不能一一分頭拜訪請教，亦無財力大事宴客，惟有懇求各位鑒此微忱，秉諸公道，能投一票即請惠賜一票。」

我想競選主席團，中央黨部兼秘書長吳鐵城先生並不表贊同，經詢問再三，始知中央已擬定一份四十三人的名單，將密交代表中之本黨同志按單照圈，而剩餘之三名已內定由不列名單之陳誠、陳立夫、朱家驊三人競選。而此三人者實爲當時國民黨大會黨方之領導人，握有充分之選票。情勢至此已甚明朗，我若堅持競選到底，實屬不自量力，難怪鐵城先生堅不贊成。開票結果，我以四〇一票獲得候補第四名，後來當選主席團的吳貽芳、陳誠、陳立夫三人請辭，而以次多數的邵力子、丁惟汾、田炯錦遞補。邵力子再辭，遂以第四名的我遞補。主席團四十六名，蔣公高居龍首，我正好敬陪末座，但這個龍尾可真得來不易。最令人感動的是，當時于右任先生曾公開表示，周某是好人一個，一定要投票支持他，否則以我這樣一個既非CC，又不是青年團，又不屬政學系的人，要想在主席團敬陪末座談何容易！

鐵城先生爲人好，待人親切週到，我與他交往三十多年，在名份上前十餘年是朋友交誼，後十餘年是部屬關係。但以他的謀國忠忱，誠懇態度及負責精神而言，我在做他的朋友時，心理上

早已把他視同長官了，而在作他的部屬時，又覺得好像是他家庭中的一員。我在他底下做事多年

多次，從未存着以能升遷爲榮，可圖利爲樂的心理，因爲他把熱情和誠懇灌輸給我，使我經常沐浴在溫暖和快慰之中，而不覺得有求名與牟利的必要。鐵老對我的愛護和關切，可謂無微不至。當主席團開會時，他常私自叮嚀我務必少說話。有一次，主席團開臨時會，孫科輪值主席，介紹溥儒

（心齋）到會陳述憲法中應增列有關滿族字句條文，以示對滿人地位之尊重。這問題來得太突然，大家事前無備，溥儒講畢，會場一片寂靜，與會者相視無語。我忍不住起立發言道：「滿洲是一個大民族，所佔地方亦大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過去旗人坐食『皇糧』，以致缺少謀生技能，因而所從事者在南京多爲車馬夫、船夫等較爲卑下之工作（廣州旗下街甚至成爲旗人操賤業之所）。記得我在南京擔任首任財政局長時，原設有旗民生計處，以八卦洲收入所得供養旗人。此雖爲良法美意之措施，但長此以往，養成他們依賴心理，限制其發展，結果反而於他們有害。現在民國已成立三十餘年，旗人多已改從漢姓，生活習慣也已逐漸漢化，滿漢畛域可謂已不復存在，何況東北已改爲行省，藏回兩族很快將同獲相等地位。溥代表從滿族的立場提出此建議，原則上無可厚非，但爲順應潮流起見，我們似乎不能不多爲滿族的前途設想，因此之故，溥代表的建議似可不必考慮！」話畢，大家羣起鼓掌，把溥儒當場氣走，這是我對主席團的唯一貢獻。事後我問鐵城先生道：「你經常告誡我不要多說話，今天

何以也鼓掌？」他含笑答稱：「今天正需要你的勇氣啊！」

當選立委細數票源

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憲國民大會通過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」，下午旋即舉行閉幕。翌年元旦，國民政府明令公佈憲法，準備還政於民。不久通過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」、「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」。三十六年夏天，我由財政部請假半月回贛北作競選立法委員之巡迴演說，抵景德鎮時忽接鐵城先生電報謂：「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出缺，已與岳公（行政院長張羣）商妥，派你接充。」我想這職位很輕鬆，不致影響競選，遂回電表示同意。俟巡迴演說畢，即回南京就任新職。

三十七年正月，省方公佈立法委員候選人名單，我也在內，須再回江西從事決選活動。鐵城先生聞訊頗不表贊同，他以爲僑委會是粵、閩兩省人的天下，我是江西人，地位超然，但於僑務有悠久歷史與成績，當可有一番建樹。這是鐵城先生的遠見，但他還有一層未表明的私見，即希望我與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的他互相配合，我則以爲官職「動盪殊甚」却之。

臨行之前，我於一月三日晨至行政院辭行，適張院長岳公（羣）忙於接見外賓，乃在參事室等候。參事周君亮只是道義之交，他聞我即將返回江西競選立委，力勸我打消原意。我說：「士各有志，何可相強！」他說：「我們是好朋友，所以不妨直言。你不是CC，不是青年團，也不

是政學系，而又久離鄉土，不是土豪劣紳，可謂「四大皆空」，何來選票支持？」我聽了大不以為然，正色答道：「贛北區二十一縣有四個立委名額，我敢同你保證，我若是第二名當選，便算我失敗！」他表情一愕，瞪大眼睛道：「看你是老實人，竟還會吹大牛！」我說：「這絕不是吹牛！」他恍然大悟道：「那我明白了，你想用錢買？你是否在財政部搞了錢？」我仰天大笑說：

「想拿錢買票的人很多，恐怕還輪不到我。至於我在財政部有沒有搞錢，那是天知地知，無需我多說之事！」他茫然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那你有何妙方？」我說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！」他反問道：「願聞其詳！」我說：「現在公路尚未開闢到鄱陽，我鄉古老而純樸的風俗仍然保持無缺，所以我有這個自信。我可以坦白告訴你，我幾項競選的本錢：

「第一，鄱陽在江西是大縣，素有『魚米之鄉』之譽，沃野千里，人煙稠密，而我家在鄱陽又是世家大族，除世代讀書耕田，忠厚傳家外，點翰林、中進士、舉人而入仕者亦不在少。記得我家中堂掛有一副大字對聯，聯云：『忠厚傳家久，詩書繼世長』，並有一間『問心處』，這可說是我家歷代相傳的座右銘。曾祖父為官清正，終其一生積蓄有一萬元，以其半數置田養家，餘半作為修橋補路，造福地方公益之用。因此一談起『鄱陽周家』，地方上莫不異口同聲讚許。有此先人澤蔭和親族之支持，這是我競選的最大資本。

「其次，當民國十五年冬北伐進軍至江西時

，蔣介石總司令派我為贛北財政處處長，於軍事控禦之際為北伐籌措軍費。論實際，江西並不富裕，但我遍訪地方正派士紳，請他們擔任撥捐局長，幫忙籌錢，結果成績不惡，也因此與當地士紳建立起真實感情。地方正派士紳的支持，是我競選的第二項本錢。

「再者，我自十七歲起即從軍為國事奔走，由於民五潮汕之役驅逐偽鎮守使馬存發有功，民九至十一年奉總理之命前往古巴辦黨，民十五年冬任九江海關監督兼江西交涉員收回九江英租界有功，遂成為故鄉家喻戶曉的人物，一般家庭教其子弟便常以學習周某人為訓，年輕人受此影響而從軍者不少。此外，我利用鄱陽『薦福宮』（原陶侃廟）在抗日時期創辦一所中學，取名土行（含有紀念管仲陶侃字士行之意），敦請正派人主持校務，藉以收容培植青年，免其誤入歧途，及至我要競選立委，學校已有兩期畢業生，加上在校師生之熱烈支持，這也是我角逐中央民意代表的一大票源。

「至於我對故鄉的貢獻，主要當推對農業的改良。緣江西自景德鎮以下昌江兩岸皆為肥美之地，農產品如米、黃豆、黑豆、煙葉、油菜等均大量生產，因此農產品之改良關係民生最大。我有一個堂姪於高中畢業後，被我帶至北京進北平大學農學院學品種改良，又入嶺南大學繼續研究稻作生產，頗有成績。民國二十四年，他與江西農學院合作，在昌江太陽鋪設立『民生農場』，專門研究稻種改良，結果得出一種適合在本地種植，且具有五項優點的稻種，這五項優點是：(1)

每棵稻穗多至十至八粒，一畝田可增收二至三斗；(2)漿水較前充實；(3)早熟五至七天左右；(4)耐水耐旱較久；(5)莖桿較硬，抗風性強。民國廿五年，我為了競選制憲國大代表，便把改良所得成果與附近農家分享，盡力造福農村。不幸稻種改良推行不到二年即遇抗戰軍興，這次我重來競選立法委員，雖已事隔十年，但農民支持的熱情並不稍減。」

民國三十七年正月，我在贛北從事競選活動，與鄱陽另一候選人姜伯彰遭遇。鑑於地方過去有械鬥之風，我不願因選舉拉票演成流血事件，使地方結仇蒙受不幸，所以與姜伯彰約法三章，言明兩人均不在鄱陽拉票，本縣票由兩人平分。結果他並未履行諾言。贛北在江西屬第四選舉區，選舉結果我以三十四萬票居首，其餘依次為涂公遂（團部支持）、羅運炎（九江基督教會、青年會支持）和姜伯彰。

「一四座談」 「民主自由」

當選立法委員後，我又回到南京，暫住於桃源新村僑委會副委員長公邸。

某日，一位北伐早期時代的朋友，也當選立委的陸福廷（心亘）兄偕同端木傑（安徽人，後任交通部部長）兄來找我。寒暄過後，端木兄開門見山說：「現在各地選舉均已告一段落，距離開會日期也不遠，不知老兄有何想法？」我也照實說：「你們來得正好，我也要約大家談談。我聞得議事規則規定，立委提案需三十人附署，過半數始能通過，心裏正煩惱着。我們不

是CC，也不屬於青年團，又不是政學系，更沒有什麼藉口，據我的經驗，要找三十人附署，恐怕不甚容易！還記得國民黨六次大會在重慶舉行時，我就面臨提案提不出的苦痛，更遑論通過提案矣！歸根一句話，沒有組織是不行的。我們是地方選出來的，要代表地方發言，屆時如果我們連提案都提不出，豈不使我們的選民大失所望！假設我們的提案提出來，即使通不過，地方人士閱報，也可以有所諒解了。」端木傑聽了興奮的說：

「你這一番話太重要了，我願意結合一些尊重地方意見的人，促使將來提案能夠提出。」這便是「一四座談會」的緣起。我們的結合是很自然的，主要在團結一些沒有派系而又是正派人士的力量，就是有黨無派的結合。當時立法院每週二、五開會，我們便在星期一、四兩個晚上集會，先交換意見，「一四座談會」因此得名。參加座談會的人數不斷增加，可見號召力之大。座談會最初在我的住處舉行。後來因黃紹雄來找過我的緣故，為避開他不得已遷至漢口路王委員俊（達天）之家。當時黃紹雄三番兩次登門造訪，或留字約我餐敘，目的想加入我的組織。我迴避再三，最後只得對朋友們表明立場道：「黃紹雄的色彩太濃，以前我沒有和他們在一起，人家已經疑我是桂系，如今若真讓他加入，別人更要說是桂系的了。我的住處距離黃紹雄家不遠，太過惹眼，座談會還是遷地為良吧！」黃紹雄仍緊追不捨，並不死心。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我們想出一個辦法來對付他，那就是在章程上規定，凡是新會員之入會，必先由舊會員投票白子決定。如

有一黑子，即表示入會事緩議，俟另開討論會裁決之。若是兩黑子，即表示不予考慮。黃紹雄入會因此沒有成功。這個辦法雖然專為對付黃氏，但以後演變結果無異每一會員均享有否決權，使新會員無法輕易入會，為此得以永遠保持我們的超然立場。「一四座談會」的會員一度增加至九十餘名，王俊、張靜愚等均屬其中要角。

吳鐵城先生最初並不太注意「一四座談會」，也始終未加入；有人說座談會是他發起的，他也耗費了不少錢，這是不確的。不過，「一四座談會」後來與另外三個政治力量聯合組織成爲「民主自由社」，便與鐵老發生關聯了。因爲「民主自由社」的成立係經過最高當局的默許，吳鐵城、張羣、翁文灝（詠寬）三位先生都一齊加入。在立法院六百多議席中，「民主自由社」佔二百六十席，足見其聲勢之浩大。我是鐵城先生的代表，當選爲四幹事之一，另外三人是陳博生（代表中央社）、孫桂藉和鄭豐。

確保廣東感慨萬端

民國三十七年冬，大陸軍事局勢逆轉，副總統李宗仁乘機倡國共和談之議，要求蔣總統下野。次年一月，蔣總統宣佈暫行引退，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，開始與中共談和。未幾和談破裂，共軍大舉渡江。三十八年四月，政府南遷至廣州。五月十日，立法院在廣州集會，行政院長何應欽報告和談破裂經過。此時各處人心惶惶，大家一見面便互問：「那一天走？」而無人研究應付良策，政府各機關也紛紛作撤退準備，絲毫沒有戰鬥

意志，更談不上死守疆土，與城池共存亡之決心。當此大局動搖，人心渙散之際，我在立法院提了一案，請政府振奮民心，確保廣州作爲復興根據地。會中我激昂慷慨道：「從前國父領導革命之時，並無一塊立足之地，黃花崗之役革命精英毀於一旦，所爭者不過一總督衙門而已。今天我們還都是國父的信徒，仍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，我們還擁有西南半壁河山，爲何敵人還沒來到，大家只顧逃走，而不想守呢？撤退是萬不得已之事，現在共軍尚未進入湖南境內，而我們已在作撤退之準備，這豈非拱手讓敵乎？如此下去，人心豈能不渙散，國家前途豈堪設想！爲了振奮人心，爲了穩定大局，我們一定要確保廣東！」我在臺上激昂陳詞，臺下却有人嬉笑說：「大家都快走了，你還囉嗦什麼？」此案好不容易湊足法定簽署人數，也終於勉強通過了。

三十八年六月，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，我前往求見並請他執行立法院決議。不料他用山西土話敷衍我，簡直答非所問。不得已透過好友陸福廷關係，同往求見代總統李宗仁，李對此事不置可否，只答應將來與蔣先生商量，因爲那時蔣先生即將到廣州。不久，蔣先生果然抵達廣州。我們久等無消息，只得再去問李宗仁與蔣先生商量情形，結果不歡而歸。至十一月中旬，國軍終於撤退，把廣州拱手讓出。這個案等於白提，我爲此很表遺憾。最令人憤慨的是，到臺灣後，有人藉口我在廣州與李宗仁見面兩次，向最高當局打小報告。這種不問是非，一味羅織罪狀，陷害打良的心術，實在使人痛心無比！